

点亮台湾老兵魂归故土之路

——记 2012 年度“感动中国”十大人物之一高秉涵 本报记者 曹刚



7 杯泥水 无尽思母泪

单身时,高秉涵老想家。那时以为,成家后能减轻思乡之苦。没想到,有了小家,更想老家。思乡,像是心头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,稍稍触碰,便自动裂开,血流不止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,移民阿根廷的老乡下永兰回家探亲,特意绕道台湾,她的记事簿里写满了旅台同乡的请求——吃老家烧饼,看老屋照片,找失散娘亲……高秉涵央求说:“带点故乡的泥土吧。”所有人举双手赞成。

3 公斤故乡黄土和一大箱土特产,从菏泽到台湾,如约而至。百余同乡济济一堂,感受睽违多年的故土气息。大家抹着泪,听下永兰动情讲述家乡变化,然后,眼巴巴地等着分礼物。

每家 1 个烧饼,3 个耿饼,山楂和红枣各 5 粒。可泥土怎么分?

高秉涵是律师,大家一致推举他来分。“每家分一小勺。”

四周瞬间安静下来,所有人屏气凝神,等待生命中一场重要的仪式——高秉涵一手拿汤匙舀土,另一手用筷子轻轻将平冒出的土尖,倒在纸上。

分到土的人,表情满足而哀伤,小心翼翼地捧着。有位老先生,不小心撒了,边捡边哭。

因分配“乡土”有功,高秉涵获准多得一勺。他把一勺土锁进银行保险箱,另一勺分成 7 份,分别掺 7 杯水逐次喝下。

每次喝水之前,他会用力晃晃,让泥土与水充分混合。“那是家乡的味道,无味也甜。”高秉涵含在口中,半天才舍得咽下。“水从嘴里进去,又从眼里出来。我流的思母泪,何止 7 杯啊。”

起初,他一个人悄悄躲进地下室唱。妻子石慧丽见丈夫双眼红肿,问出实情。以后再唱,她都会默默递上一条毛巾。

“爹,娘,今天我带着‘感动中国’奖杯,给你们磕头……”4 月 17 日,高秉涵在山东菏泽祭祖。年初接受颁奖,举起奖杯那一刻,他说自己只有一个念头:“我想我娘。”

高秉涵把奖杯放在父母坟前,捡走落枝,轻添新土。他觉得,父母如果九泉之下有知,“定会称赞

我是一个点灯的人,一个为社会尽孝的人”。

20 多年来,他护送上百坛台湾老兵骨灰回大陆,点亮孤独亡魂回家的路。13 岁离乡,颠沛流离,长夜痛哭,心里放不下的,就是回家。

家是妈妈的叮咛,家是故土的芬芳。回家,是天大的事。

多咬了一口,只有一口

1948 年,13 岁的高秉涵告别老家。在小学教书的母亲宋书玉担心长子安危,让他投奔国民党设在南京的学校。临行前叮嘱,如学校解散,一定要紧跟人潮,跟着帽檐有太阳的部队走。

“要活着回来。”这是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离家那天是农历八月初六,石榴熟得裂开了口,外婆随手摘下一颗,塞给高秉涵。他在菏泽城东关上车,与母亲泣别。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,他忍不住低头咬了下去。同学推他说:“你娘在跟你打招呼呢。”

多咬了一口,只有一口。再回头,车子刚好拐弯。“看不见妈妈,我抱头大哭,把石榴扔了。后来每次看到石榴,就伤心,想妈妈。”

65 年过去了,高秉涵再也没和母亲见面,再没吃过石榴。

颠沛流离的日子里,山东少年随汹涌人潮,努力求生。混乱中,他双腿被滚烫的粥烫伤,无处医治,伤口腐烂生蛆。

采访时,高秉涵掀开裤腿,大片黑色死皮疤痕触目惊心,这些逃生路上的烙印,已伴着主人一起慢慢变老。

伤口疼痛刺骨,太难熬了。有好几次,高秉涵想过死。“为了活着见妈妈,我要挺住。”长途跋涉半年,他来到厦门海滩,被人流裹挟着挤上赴台湾最后一班船。

初到台湾,他睡火车站,和狗搏斗,到垃圾桶抢食。举目无亲,艰难而顽强地活着。

逢年过节,高秉涵常独自上山,对着大陆,放声哭喊:“娘!娘!我想你!”他半工半读,凭不懈努力及老乡帮助,考入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和台湾“国防管理学院”法律系,毕业后到金門任法官。1973 年退出军界,成了律师。

“换做我,比他逃得还快”

很多老兵在台湾没成家,也没后代,郁郁寡欢,只想回家。1964 年,高秉涵判过一个这样的人死刑。

一名郑姓士兵思母心切,冒险抱一只轮胎,试图游回厦门的家。第二天一早终于登岸,他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:“别杀我,我是回来看看妈妈的。”

殊不知,游了一夜,海水回流,又被冲回金門。“他以为到厦门了,结果一上岸就被抓。”按当时台湾“军法”,他难逃一死。

这名逃兵当年是厦门渔民,出门给瘫痪在床的母亲抓药时,被强抓入伍。

明知险象环生,他仍决意要逃,因为挡不住家的召唤——部队驻防金門,离厦门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。天晴时,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。咫尺天涯,痛彻心扉。为见妈妈,他不惜一切代价。

“探母无罪。我是刽子手,杀害了一个想回家的人。他一直说要见妈妈,我受不了。”这份死亡裁决,高秉涵下得很痛苦。“如果换做我,比他逃得快,逃得早。”

临刑前,逃兵提出最后要求:委托高秉涵将珍藏多年的给母亲买的药,带回厦门。一些药片,几成粉末。他每次想起这个细节,内心都刺痛难忍。

20 多年来,他坚持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乡,既是身为儿子的一次次救赎,也为安抚天下盼儿归家的母亲。

两岸开放后,高秉涵首次回大陆,就去厦门找那名逃兵的母亲。“她若同意,我愿尽孝。”只可惜,斯人已去。

在那位冒死回家探母的士兵身上,高秉涵看到了自己。他借诗抒意:“我在他方流浪,母在彼岸感伤。岛过处,还是岛,汪洋远处,仍是汪洋。茫茫大海,何处是爹娘。”

寒风冷雨中,没有寒衣

高秉涵从未放弃联系母亲。1979 年,两岸还没通邮,他去西班牙开会,借机投出家书,辗转多国,寄回老家。他在信里呼唤:“娘,我会活着回来……你一定要等我!”借此鼓励母亲,坚强地活下去。

信寄出后的几个月,漫长如同几个世纪。噩耗伴着回信,姗姗来迟。拆信之日,母亲已去世 13 个月。

上世纪 80 年代,高秉涵两次在香港与家人会面,抱头痛哭:“咱娘不在了,连说句话、磕个头的机会也没了。”

弟弟告诉他,母亲常年沉浸在漫长的等待和思念中,直至生命尽头。“我走以后,家里就没了笑声。除夕夜吃团圆饭,妈妈总是泪流满面,很少动筷。”餐桌旁,会多放一个碗、一双筷,“过年了,妈妈让我陪她吃一餐。”

在母亲宋书玉枕头底下,藏着儿子幼时唯一一张照片,和他穿过的小棉袄。枕着这些宝贝,她想儿子想了这辈子。

对母亲,高秉涵留有两个印象:一是白天,留短发,穿中山装的教书先生,表情严肃;二是晚上,煤油灯下做棉袄时哼唱:“寒风习习,冷雨凄凄……”母亲心里,想起娇儿,没有寒衣。”他至今记得这段旋律。“我需要温暖,需要妈妈。”

母亲拔过的火罐,用过的体温计,用来捣蒜的小钵子,残缺眼镜,褪色头绳,他都悉心收藏。一件湖蓝色旧绸衣,一直挂在墙上,不舍得洗,怕丢一根丝。他每天用头、用脸顶顶旧衣裳,“就像回到了妈妈怀里。我快 80 岁了,还跟小孩儿一样。年龄越大,越想妈妈。”

最多时,家存 7 坛骨灰

1987 年 10 月,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。4 年后,高秉涵踏上阔别 43 年的故土,在村口站了半小时才敢走进。“我怕,唐诗‘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’,形容到极致了。”他为孙女取名佑荷,即保佑菏泽之意,还创立台湾菏泽同乡会,为家乡设奖助学,捐钱修路。

但许多老兵直到人生谢幕,也没赶上这天,只盼有人帮自己了却回家的遗愿。一开始仅老乡请托,有媒体报道后,许多陌生人也来找高秉涵,还有些电话来自大陆,请他寻找在台亲友,或帮助办理遗产继承。

有时,他把骨灰交给老兵家属,但遇到无亲无故的,只能找一块玉米地或一棵大槐树,撒灰入土,感叹说:“老哥,你算真的回家了。”

自己百年后,他也盼归乡。“撒到村庄周围,无需骨灰坛,也不用扫墓。太太如有意见,那就一半留给她,一半带回老家。能叶落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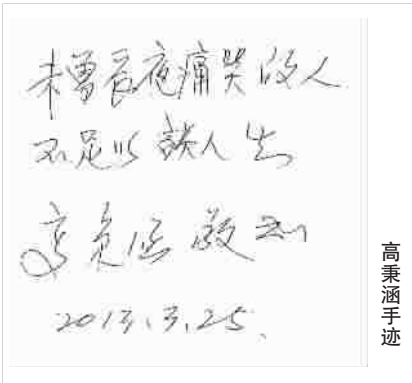
根,走也心安。”

年近八旬,骨瘦如柴,却手捧七八公斤重的骨灰坛,来回奔波。妻子说:“大家都知道是好事,都称赞他,但都不愿去做。”

出发前,高秉涵会先按手续领出骨灰坛,暂存自家。妻儿起初难接受,女儿还曾被吓得尖叫。“不合风俗,感觉怪怪的。”妻子建议存别处,送前再取。他坚持:“存取太麻烦,全是老哥们,没事。”

最多时,家里存了 7 坛骨灰。家人还没习惯,邻居又开始投诉。“想到同一座楼里放着骨灰,他们就害怕,轮流上门抗议。”有一回,儿子回家哭着说,隔壁同学的奶奶嫌他晦气,整天和死人同住。

大家最终被高秉涵的坚持感动。妻儿后来常去机场送行,抢着帮忙。怕旅客有意见,他每次上飞机,都提前装坛入箱。



活在感恩里,无惧死亡

有一次,高秉涵受同乡遗属之托,去花莲群山深处领骨灰。上山途中突降暴雨,随时可能塌方。出租车司机怕危险,提前折回。高秉涵不愿放弃,冒雨步行上山。赶到公墓,办完手续领到骨灰坛,已夜幕低垂。

凄风苦雨中,找不到车,高秉涵只能留守山间。抱着骨灰,在墓地熬了一夜。他说不怕,“活着的人跪谢我,佩服我;死去的老哥爱我,感谢我,在地下列队欢迎呢。我活在感恩里,所以不怕死。”高秉涵不只一次梦见,他回到了菏泽,老哥们手拿鲜花排队等候,抢着拿行李,他和他们一一握手……

花莲,夜雨迷蒙,高秉涵恍惚间觉得墓碑下的老兵复活了,一幕幕场景在眼前闪回——忽而光着脚丫,在童年的田埂上追逐嬉闹;忽而身陷枪林弹雨,穿梭于弥漫硝烟;忽而撒腿狂奔,冲在浙闽崇山峻岭之间;忽而步履蹒跚,走在台北闹市街头……

岁月流逝,老兵们终将迷失在雾一般的岁月里。微风拂过,高秉涵仿佛听到漫山遍野的老哥们在地下齐声呐喊:“我要回家!”

他听得心惊肉跳,哀婉惆怅之余,顿觉重任在肩,必须抓紧时间,帮更多人了却夙愿。他说,台湾还有 21 个菏泽老兵等着。“老哥拜托我别先走,要等他们都走完,任务才算完。过去,他们牵着我的手来到台湾;现在,我要抱着他们的骨灰回家。这是责任,也是感恩。”

“我会送到走不动为止。”高秉涵眼下迫切想找到慈善机构,传承这份责任。“全台湾有几十万老兵期盼魂归故土,我毕竟只能帮很少一部分。”